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四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一期 ——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7d)

---

【专题研究】	简述中共在文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重庆市为例	何 蜀
【亡灵祭坛】	音容	方 非
【史海钩沉】	批判相对论轶事	杜钧福
【往事追忆】	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	戴维堤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研究报告】

简述中共在文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以重庆市为例

• 何 蜀 •

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开篇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来是通过各级中共组织来体现的——因此在 1957 年，那些批评本地区本单位中共组织甚至一般中共党员的人们就有许多被视为“反党”而被打入另册。然而，在文革初期，为了充分发动人们起来“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23 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在此理论的鼓动下，“打倒一小撮”迅速演变为“打倒一切”，各地各级中共组织（连带由中共组织控制的政府机关）相继瘫痪（随即又被宣布“夺权”），许多地方一度形成了“半无政府状态”（只有中央政府而无地方政府）的权力真空局面。在不同地区和单位，这种各级中共组

织停止活动、失去“领导核心”作用的局面到底从何时开始？持续了多长时间？在新的党组织重建之前，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新的党组织何时重建和如何重建？……无论是党史、国史还是文革史，对此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以重庆市的市级中共组织在文革中的演变情况作为典型个案，略作概述与分析。

#### ◇ 旧市委：从领导文革到完全瘫痪

重庆市建国初期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大区撤销后，1954年7月改重庆为四川省辖市，重庆市委改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因重庆在四川地位特殊，文革前夕的1965年11月，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增补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原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增补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6年3月18日至28日，中共重庆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出中共重庆市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28日举行的市委二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任白戈、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岳林、廖苏华、丁长河、杨松青、段大明、谢家祥、唐兴盛等11人为市委常委，任白戈为市委第一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岳林、廖苏华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丁长河为候补书记。市委常委中的谢家祥是驻重庆的陆军第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政委，唐兴盛是重庆军分区党委书记、司令员（任白戈兼重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委）。

重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这一届市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及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指示展开。批判“《重庆日报》三家村”，批判“张黎群黑帮”，批判“萧、李、廖反党集团”，批判重庆大学“郑思群黑帮”等等，都是在这一届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不过，正当重庆市委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却遭到了意外的打击：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突然袭击地点名（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注释中）批判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在这一意外打击下仓促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来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复（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白戈被以“请假检查”名

义停止工作。重庆市委由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主持工作。

7月19日，中共重庆市委成立由鲁大东任组长、辛易之任副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为贯彻执行全会决议，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8月24日，李井泉亲临重庆坐镇指导，并带来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协助重庆市委工作。刘文珍分工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燕汉民分工抓大学文革运动。

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刘文珍作了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讲话，李井泉讲话中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将任白戈罢官。

在这段时间里，重庆的文革运动，包括市委工作组逼死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成立官办的红卫兵、赤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抄家，毁灭文物古迹，更改街道、商店名称……），集训中小学教师（搞“人人过关”的相互揭发批判），打击各单位被划为“三、四类”的人员……都是在以鲁大东为首的市委领导下以及李井泉等上级领导的指导、督促下进行的（工人纠察队的名称都是李井泉定的）。后来有人把官办红卫兵抄家、毁灭文物等等说成是造反派所为，与史实不符。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群众性造反运动掀起高潮，重庆市委处境日益艰难，但工作并未停顿，“领导核心”作用也还没有失去。11月3日至13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讨前一段时间里市委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号召各级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群众在一起，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11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相继发出〔66〕171号和172号《通知》。前一《通知》规定：凡在前段运动中被各单位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和“政治扒手”等的师生、职工和农民，应宣布一律无效，并公开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凡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和工作组，都要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后一《通知》宣布：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为了更好地推动重庆市的平反工作，组织了重庆市革命平反监察委员会，并已开始工作，各单位应大力支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96页）

直到12月4日发生造反派冲击保守派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引起大规模武斗冲突的“一二·四”事件，市委都还在艰难履行着领导职责。当市委得知造反派可能要到工人战斗军大会会场上去造反的消息后，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两派冲突十分担忧。竭力想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主持市委工作的鲁大东1967年初在一份公开检查中回忆：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辛易之和燕汉民对我讲，街上贴出了海报，十二月四日工人战斗军要在太田湾开大会。十一月三十日黑市委书记处和燕汉民在潘家坪开会，十二月一日在小温泉召开了干部会，说明市委已经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再滑下去，就有变成四类干部的危险。联系谈到十二月四日工人战斗军召开的大会，一定要说服他们不开，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十二月二日上午我和辛易之在重钢招待所会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三人……我发言的大意是：目前少数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十二月四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会见最后，他们表示非开不可，楚光辉还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我才表示给他们准备开会条件，以示支持。十二月二日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十二月四日的大会。十二月三日和夜晚，王廉仍多次劝说他们不开大会，结果无效。（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1967年3月4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1日翻印）

从这一回忆可知，重庆市委当时的领导作用已经十分有限（连保守派都不听招呼了），但是市委尚未瘫痪，还在艰难履行着领导职责，力图制止动乱。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冲突后，社会秩序大乱，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之间冲突不断，12月17日，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当着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面，代表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发言，公开喊出了“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的口号。重庆市委这时已经被造反派称为“黑市委”，很难开展工作，基本转入“地下”状态，但是仍然没有完全瘫痪。

市委书记处书记岳林在1967年初写的一篇公开检查中说：（1966年底）“市委办公厅周炳林向我反映，市委有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市公安局，怎么办？当时我同意拿回来，不能放在公安机关。在未拿回来之前，大约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晚上，书记处碰头会上（书记全部在场），廖苏华又提出这个问题，鲁大东同意该保存的保存，该处理的就烧掉，辛易之亦表示没有意见。”（岳林《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1967年3月1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由此可见，在1966年12月底，重庆市委书记处还开过碰头会。

12月31日，重庆市委的舆论喉舌、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被报社造反派夺权。从次日（1967年1月1日）起改出《新闻报道》。

工人战斗军不甘心“一二·四”大会被造反派冲击而流产，决定在1967年1月4日（即“一二·四”事件一周月之际）再次召开大会，表现他们同样能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得知后，有人又准备再次对大会进行“造反”以制造事端，进一步打击保守派。重庆市委深感担忧。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1967年3月1日所写《初步检查》中说：“一月二日在说服工人战斗军不要开会时，一方面批评他们思想保守，应该向革命派学习，一方面又从物资上解决问题，没有勇气拒绝。”（辛易之《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1967年3月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可见直到1967年1月初，辛易之都还在以市委书记身份做工作和批条子。

然而，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已经掀起。1月6日，最早发生学生与市委领导人正面冲突的“八一五”事件、最早起来造反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院校所在的沙坪坝区，造反派与区委机关“七一”战斗队、区人委机关“星星之火”战斗队一起宣布夺了区委、区人委的权。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26日改称沙坪坝区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区临委）。这是重庆市第一个区委及区政府被造反派夺权，彻底脱离了重庆市委的领导。

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去贺电。表明了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确态度。这一信息使重庆市委领导们对形势彻底打消了犹豫观望态度，辛易之在向群众所作的《初步检查》中说：“这时感到形势逼人，再不能拖了，必须从思想上彻底弄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月16日，造反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布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发起总攻击的《总攻击动员令》。同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勒令“黑市委”领导人到重庆大学报到接受批判。

对重庆市委领导人在1967年1月上、中旬的行踪，有一份历史资料作了具体记载。1967年4月初，因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发表“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中称：“一月十七日深夜，在（重庆）市委交际处，黑市委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公安局长孙斌和重大八一五总团周××黄××熊××密谈”搞“和平让权”。重庆市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丛中笑》战斗组于4月17日发出一份传单《紧急辟谣》，说，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从1966年12月“杀出来”造反，不存在1967年1月17日“黑市委”与重大八一五头头在交际处开会密谈的事，在这份传单中还详细列举了“黑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的行踪：

鲁大东——于元月二日乘汽车去成都，四日乘机赴京（引者注：鲁大东1967年3月4日《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中说：“今年一月我去北京动员工人纠察队返回重庆搞生产……”），元月二十三日下午由京返蓉，二十四日晚回渝。

辛易之——元月八日去重庆日报，十三日由报社与交院九·一五同学刘××、中学生红卫兵陈××、何×，北航红旗马××、北地东方红朱×一同去交院九·一五，元月十九日由交院刘××、肖××与辛一道去綦江铁矿。元月二十二日晨一时从綦江返交院，元月二十二日去大田湾开会，会未开成，后由电力学校带去约十多天，又由交院刘××带回交院九·一五，直至二月二十四日市委造反派才要回交“革联会”。

廖苏华——因元月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了要黑市委头头到重大报到的《勒令》后，于十七日晚七时，廖从人事局处乘车去重大报到，十八日，市公安局造反派曾带回市局交待问题，后仍送回重大，直至二月下旬才送交“革联会”。

从这份资料可知，重庆市委书记处的领导们，先后于1967年1月上、中旬停止工作。重庆市委的完全瘫痪，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 新概念：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无产阶级司令部”早已抛出一个“新概念”：“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抛出这个“新概念”的时候，各地基层党组织还没有面临瘫痪的局面，许多地方造反派还没有起来，已经出现的造反派大都还是少数派，尚未对基层党组织形成威胁。但是，为了鼓动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或许也是“高瞻远瞩”预见到了即将出现“打倒一切”、党组织全面瘫痪的局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抛出了这个“新概念”。1966年8月25日，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排名第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与张平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起接见中南地区在京同学时，陶铸在讲话中就十分明确地说：“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

8月31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讲一讲党的领导的问题。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党的领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违反了党的领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搞清楚。我自己也没搞清。这次长沙镇压学生的事件是在什么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在‘三相信’的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它的思想准备。‘三相信’就是相信党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队或者工作团。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反动的。”11月12日，谢富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有同学提出有关党的领导问题，刘宁一回答：“毛泽东思想是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在报纸上发表，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错。”谢富治则明确说：“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陶铸在12月5日接见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中又说：“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委如果很好，执行毛泽东思想，则就能代表党的领导，相反，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如果他执行了毛泽东思想，照样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你不能执行，他执行了么，党委不行了，你们就代表党委执行党的领导。”（以上讲话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这些讲话显然不能说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由这样一些不同职务的高级领导人（其中除谢富治外还都是党史上的“正面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出同样的“新概念”来，表达的当然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集体见解（或曰“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有关“党的领导”的说法虽嫌牵强，但也确实符合一段时间里的社会实际。在中共基层组织纷纷瘫痪之后，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基层单位就是通过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和思想控制来体现的。当时已经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无不以“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自诩，对来自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无不雷厉风行坚决照办，有时甚至比以前的中共基层组织显得更“革命”，更“左”，比共产党更“共产党”。比如，中央提出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提出不允许建立全国性的跨行业、跨地区群众组织，不允许建立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群众组织，不允许建立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等等，本来都是限制、约束造反派的措施，但是造反派无不竞相表态响应号召，坚决照办，甚至采取激烈行动落实中央的意图——比如，首都三司帮着中央镇压临时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又比如，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发现重庆最早建立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二七战斗团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刘红有乱搞打砸抢和冲击中南海、殴打解放军等劣迹后，为“纯洁造反派组织”，主动到重庆市公安局要求将刘红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被公安局以“十六条”规定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外都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为由拒绝，二七战斗团又将刘红开除并“扭送”公安局关押审查。

不过，这个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取代中共组织领导的局面为时极短。在重庆市，最多只持续了半月左右，很快就有另一个中共组织——五十四军党委取代了原重庆市委的地位。

#### ◇ 驻军党委：缺乏权威的领导核心

从1966年底到1967年1月，地方各级中共组织受到冲击、相继瘫痪之后，只有军队党委系统是受冲击最少或基本未受冲击、保存最为健全的党组织系统。

陆军第五十四军军直机关驻重庆（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后又称重庆警备区）。政委谢家祥（军党委书记，1967年7月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是文革前夕当选的重庆市委常委（五十四军是当时成都军区辖下唯一的一支军级野战部队，其级别高于重庆市委，谢兼重庆市委常委是军

队为联系地方工作方便而普遍采用的做法，并不表明谢的级别低于任白戈）。

因为毛泽东有关“党指挥枪”和军队不仅是战斗队同时还是“工作队”的一贯指示，重庆驻军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非从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时才开始。

1966年6月22日，《重庆日报》公布了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的重庆市委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重庆市委重新派出工作组进驻重大领导文革运动。这一庞大的工作组由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任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军党委书记）为政委。工作组人员包括地方干部约200人，军队干部约100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8月3日，重庆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按中共中央通知，各校工作组必须于当天下午6时前撤出。重庆大学工作组临时撤到校内刚竣工的机械系新大楼，与师生脱离接触，等候指示。滞留至8月20日，重大工作组决定撤离学校，工作组中的军队干部全部撤回部队。重庆驻军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启示和号召下，8月24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随后，重庆市委通过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们联系，并随时传达一些指示。于8月31日组织23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刘桂兰《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1966年11月20日。油印传单）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9月8日，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同时，参照北京的先例（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给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担任辅导员），由重庆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军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军党委书记）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10个解放军“联络员”。9月10日，按照重庆市委的指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态度日益倾向造反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韦统泰等又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辅导员。

这应算是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几位负责人（总部政委刘桂兰，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孟军，总部常委王桂香等）也起来向市委造反，同时对解放军辅导员提出了批评。10月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宣布撤出（实际上等于是赶走）解放军辅导员。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到五十四军军部大门口要求韦统泰出来接见和回答问题，在韦统泰出来后，采取突然行动将其绑架上车送到设于重庆市少年宫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扣留，要求其承认担任“思想兵”辅导员期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关押约一周，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了批判大会后才将其送回军部。15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山城红卫兵》报第十期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批判解放军辅导员的的文章《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一——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在这一阶段，虽然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后遭到了比前一阶段更大的挫折，堂堂军长、军党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军党委书记）韦统泰将军（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还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绑架和公开点名批判，但是，韦统泰通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多日接触，对这些与他儿女年龄相仿（他的儿女当时都在重庆的中学读书）的“革命小将”有了进一步了解。

进而认定这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热情支持的“革命小将”是开展文革运动应该依靠的“左派”，从而明确了支持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的立场。

1967年1月21日晚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听到广播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即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开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次日，在红卫兵司令部驻地少年宫召开了有37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了夺权行动方案。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五十四军党委迅速响应，立即行动起来，表示坚决支持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的革命行动。并按照《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支持造反派夺权的精神，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组织联系，表示支持八一五派夺权。五十四军党委还调看了一些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个人档案材料，研究了组成新的市级临时权力机构的人选。

1月24日至26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五十四军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1月28日，重庆驻军2000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重庆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夺权行动的公开支持。

1月29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会后游街示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

2月8日，由驻军支持重庆造反派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革联会常委12人（以后增加到21人）中有军队代表二人（五十四军刘润泉与重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骏荣）。常委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王绍川（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干部，1964年以上尉军衔转业，中共党员），就是由五十四军党委推荐并说服动员出来任职的。王绍川回忆，在革联会成立前召开的一次研究夺权的会议上：

五十四军就派来了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我对部队是有感情的，一看他是政治部副主任，我知道这在部队上是个什么角色，马上就把他当成我的首长。我跟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要我主持会议，我说不行，我出身不好。他告诉我：“你大胆干，你的档案，我们军党委调来研究了，你从小参加革命，是我们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在部队入的党，我们信得过你。”（《王绍川回忆录》，王绍川口述，何蜀整理，未刊稿）

可见，从1967年1月下旬即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时起，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党委就开始行使起领导重庆市文革运动的权力。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共在重庆的市级组织，从1月下旬开始，便由五十四军党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填补了原重庆市委瘫痪后形成的权力空白，发挥



了中共在重庆地区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后的“抓革命促生产”，“镇压反革命”，“群众组织整风”，“按车间班组实行归口大联合”等工作均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开展。

不过，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加上部队党委毕竟没有领导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这样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不再具有以前市委那样的权威。再加上造反派的分裂，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造反派（后称反到底派）拒绝服从五十四军的领导，不断将斗争矛头指向其领导人，怀疑其与“黑市委”的关系，甚至谣传该军是“李井泉的黑部队”，“重庆警备司令部是黑司令部”，后来还声称要打倒“山城赵永夫”（赵永夫是因开枪镇压造反派而被中央定为“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逮捕的前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党委在地方上的领导作用比瘫痪之前的地方党委实际上好不了多少。

因为中央要求各地夺权后要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而革联会成立时常委中的地方干部只有重庆第二商业局局长徐正身，还没有一个原市委领导成员结合进去，五十四军党委研究后推荐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但是因辛易之曾代表市委处理保守与造反两派学生冲突的“八一五”事件而被造反派称为“镇压八一五事件的刽子手”，五十四军党委此议引起造反派普遍反对，反对革联会的一派讥之为“三凑合、拉郎配”，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再加上接踵而至的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和中央开会解决四川及重庆问题，五十四军党委不得不把结合辛易之一事搁置起来。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于1967年5月16日结束，中共中央于当天发出中发（67）第15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第一条中“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并将原中共重庆市委及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称之为“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第三条中宣布：“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

尽管中央没有承认由五十四军支持建立并主持工作的重庆市革联会，但是中央决定组建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仍由五十四军主要领导人负责，实际上等于正式明确了五十四军党委对重庆市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庆地区的重大活动、工作部署等都是以市革筹、警备区名义联合行文和召开会议。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血腥的大规模武斗。五十四军为制止武斗作了许多努力，甚至付出了一些指战员伤亡的代价，但因为毛泽东对各地的大规模武斗一时尚未表明态度（甚至或明或暗地表示出纵容、欣赏的态度，将各地大规模武斗频发的时期称之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加上五十四军因介入文革后历史形成的偏袒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的倾向，制止武斗的努力收效甚微。

1968年春，重庆驻军负责人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代表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以促进大联合和筹建革命委员会。在此期间，五十四军党委（书记韦统泰，副书记蓝亦农）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义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比如，对两派群众组织推选的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最后都要由五十四军党委研究通过才能上报。反到底派不顾五十四军领导人的事先招呼（不准推选在武斗中曾枪毙八一五派俘虏的北碚猛虎团负责人邱开全，否则推选上报到市革筹后就会被否决而且不能另换他人），执意推选邱开全，结果被市革筹否决后等于自动放弃一个名额。而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阳增泰（军工系统八一五派组织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前革联会常委），本来理应进入革命委员会任职，

但五十四军党委担心其今后被查出武斗中的问题会遭到追究从而使八一五派损失一个名额，事先就给八一五派打了招呼，不将其作为推荐人选。

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蓝亦农，副主任由白斌与地方干部鲁大东、岳林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各二人担任，但实际权力还是在五十四军党委手中。此后一段时间里，重庆的重大活动、工作部署均以市革委、警备区名义联合行文和召开会议。军队干部普遍担任了各级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的“一把手”掌握实权。这一时期的“大联合、三结合”、“造反派撤销总部解散组织”、“清理阶级队伍”、“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工作都是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重庆著名的文革大冤案“一号专案”（打击迫害了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前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就是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炮制出来的。1985年3月，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领走访组专程到重庆向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地方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道歉（《重庆日报》1985年3月20日报道《“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

#### ◇ 核心小组：直接任命的市级党组织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五十四军调离重庆，陆军第十三军由云南调往川东，接替五十四军防务（调防工作至1968年12月完成）。蓝亦农随部队调离重庆，白斌早于1968年8月调任国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员。1968年12月，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免去蓝亦农、白斌的重庆市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由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军党委书记）任市革委会主任，何云峰（十三军副政委，军党委副书记）、张英才（陆军第38师师长）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经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重庆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何云峰，副组长顾永武（十三军副军长、军党委常委）、鲁大东。

这是中共“九大”之前在重庆市正式建立的新的市级中共组织。它的特点之一是上级直接任命。本来党组织应该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虽然在文革以前这种选举就已经是在上级任命的前提下走走走过场（李井泉就曾对不投他票的干部动用公安手段进行追查并打击报复），但也总还有一个“党内民主”的形式。到了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干脆省去那徒具形式的选举，倒也更符合现实。特点之二是核心小组的实权仍然由驻军党委掌握，只是比驻军党委领导地方工作有了更正式更合适的名分。

不过，当时在重庆参加“支左”的部队并不全都属于五十四军或十三军，其在地方上任职的干部未受五十四军和十三军调动的影响。如重庆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栋，时任空军第九工程总队（代号空字870部队）副政委。1967年夏任重庆市革筹小组政法办公室负责人。1968年2月任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5月任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党委书记，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任常委、人民保卫组组长。1971年3月任市革委“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主任。8月底9月初奉命回原部队。重庆的“砸烂公检法”工作就是由他按照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具体领导的（详见重庆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成林著《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自印书，2003年10月）

1968年12月13日至30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直属单位党员代表大会（有大批非党员的革委会委员、工宣队员等代表列席）。与此同时，各区县也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这是市革委成立以后（也是文革以来）重庆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主要是学习和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狠批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及所谓刘、邓在四川、重庆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学习讨论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和关于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中共“九大”之后，1969年10月2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经中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由何云峰（已升任十三军党委书记、政委）任组长，顾永武、鲁大东任副组长。此后一段时期里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工作都是由这一核心小组领导的。特别是在死刑核准权下放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造成的一系列冤案，如为刘少奇鸣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的建设银行干部方运孚案（文革后此案平反，方运孚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以“恶毒攻击”罪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枪毙的“右派分子”刘家瑞案（文革后此案平反），因所谓“反革命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的长寿县农民余方正案（文革后此案平反）等等，这一核心小组是应该承担责任的，然而至今未见有关当事人有过任何认错或忏悔的表示。

#### ◇ 重建市委：“一元化”领导的核心

1971年5月6日至8日，中共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何云峰代表中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53名，候补委员15名；市委第一书记何云峰（成都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常委），第二书记鲁大东，书记顾永武（十三军军长、军党委第一书记），副书记张英才（十三军副军长、军党委常委）、陈占楼（十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常委）、岳林、李启唐（重庆警备区政委）。常委何云峰、鲁大东、顾永武、张英才、陈占楼、岳林、李启唐、丁国文、丁长河、许佳陆、刘家碧、杨聚珍、赵伟（十三军政委、军党委第二书记）、赵桂海（重庆警备区司令员）、薛震鲁。

6月29日，《重庆日报》刊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光辉指引下，重庆市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称：目前，全市整党建党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全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多数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建立新的支部，有的建立新的支部和党委，巴县、綦江、长寿和市中区、江北、南岸、九龙坡、沙坪坝、北碚、南桐等县、区分别建立了新县委和新区委。中共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已于5月上旬胜利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并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新市委。通过整党建党，全市已建立5000多个新的党支部。在突出思想整顿的基础上，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各级党组织新的领导班子，都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所谓“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当然纯属谎言。新市委高举的是“九大”旗帜，而“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市委还有何“纯洁”、“坚强”、“朝气蓬勃”可言？说是“老、中、青三结合”，但重建的新市委仍然由军队干部主政。军人习惯的命令主义作风和“对敌斗争”思维、不熟悉地方工作而又要“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风气，缺乏监督和批评（对军队的批评很容易被上纲为“反军乱军”、“毁我长城”）造成的军人高人一等的畸形现实等等，都给“三支两军”工作带来极大的祸害，积怨甚多。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突发又引起毛泽东对军人政变的猜疑、惊惧，从而对军队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清洗。在此背景下，军队干部逐步奉命退出地方党政系统。1972年至1973年间“支左”军人陆续撤回部队。

中共“十大”之后的1973年12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鲁大东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免去何云峰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市委领导中的其他军队干部也在此前后陆续撤回部队。

至此，原在1966年底由鲁大东（以书记处书记身份）主持工作的中共重庆市委，经过

近七年的折腾，终于又恢复到了仍由鲁大东（以第一书记身份）主持工作的局面。此后重庆市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各行业整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都是在这一届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因公开写出大字报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通缉的重钢青年技术员白智清在外地“落网”后，就是由这一届市委召开全市万人大会批斗逮捕的。

综观文化大革命的全程，尽管地方上的各级中共组织曾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甚至被宣布“夺权”，但每个具体地区和单位完全脱离中共组织领导的时间极短，而且当时也仍然处于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与思想控制之下。此外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共组织都以不同形式（驻军党委、核心小组、新建党委等）体现着“领导核心”作用。文革时期仍然是毛泽东的“党天下”。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同样是中国共产党。

~~~~~

### 【亡灵祭坛】

音容

• 方 非 •

1966年的国庆节，说是意义特别重大，各路游行队伍铺天盖地。我们学校的队伍在东单一带等候，全体席地而坐。女同学按要求都穿上漂亮的花裙子，一片花团锦簇。忽然，有同学悄悄推我说：“你看，你看！”

我抬头一看，有个女人，不知怎么走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

她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一身蓝裤褂，中等偏高的身材，四十岁左右。她不看别人，单单盯着我看，嘴里还喃喃地低语着，边看边笑，边笑边看，可能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还不断点着头。我有些纳闷，这人怎么了，为什么总盯着我看？

我也不由自主地看着她，忽然，一个念头在心的深处闪动狂跳：“是妈妈？是妈妈！那笑容，那眼神，是妈妈在看我！”

那是妈妈的笑容，含着鼓励与赞许。

那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牙。被牙钻“吱”地钻着的滋味真不好受，周围很多孩子又哭又闹，搅得医生、护士和家长都手足无措。我尽管眼泪汪汪，到底忍住一声没哭。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最后医生嘱咐完注意事项，妈妈突然问：

“现在能给她吃冰棍吗？”

医生顿了一下，扭头看看我，笑了，说：

“冰棍？冰棍可以吃。注意不要吃硬的东西。”

走出医院大门，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冰。她一向认为吃零食影响正常吃饭，任我们百般央求，从来不为所动。尤其这次牙上的小洞，她说就是吃甜东西吃坏的。可今天她居然打破她自己的禁令奖励了我，含着微笑看我吃冰棍。这微笑中所含的肯定与赞扬，像阳光一样，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还有那眼神，那是妈妈的眼神，心疼而满含歉意。

那是一个星期天，妈妈带我们去公园玩。到了公园，弟妹们都跑开了，妈妈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把我叫到身边说着话。她穿一条淡紫色有花边的连衣裙，非常好看。我坐在椅上东张西望，嘴里“嗯、啊”地应着，心里急着想去玩。说了一会儿话，妈妈突然问我：

“你的脚还疼不疼了？”

我一楞，没听懂：什么脚疼不疼？

一转头，与妈妈目光中一种歉疚的神情撞了个满怀，我再一次楞住了。她俯下身摸着我的左脚踝骨说：

“让我看看，是打在这里了，还疼不疼？”

我才想起好几天以前，为了什么事，妈妈说我。我犟嘴，把她惹恼了，她正拿着一把刷子刷衣服，就把刷子朝地上猛地一甩，弹了起来，打在我的脚踝上。我蹲下抱着脚哭起来。妈妈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没有理我。

我哭过后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此时提起，连打到哪个脚都记不清了，犹犹豫豫地说：

“是右脚吧？”

“是左脚，我看见的，那天我在你左边。”妈妈一边肯定地说着，一边仍摸着我的左脚踝问：

“还疼吗？”

我想了想，对，是左脚，扬起头看着她说：

“不疼啦，早都不疼啦！”

看着我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妈妈微笑着说：

“好，你去玩吧……，不要跑得太快！”

我一边答应一边站起来，飞跑着扑向花影掩映的深处找弟妹们玩去了。妈妈的那道爱怜混杂歉疚的目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背。

我正在这么痴痴地想着，周围忽然动荡起来，有口令声让我们站起来向前移动。我们熙熙攘攘地向前走了一段路又停下来等候，我坐在队伍中，心神不宁。

不久，我又看见了她！一身蓝裤褂，隔着两排队伍站在那里，阳光照在她脸上，她微笑着，仍然只看着我，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引起了同学的诧异，旁边的同学问我：

“她干嘛老看着你呀？”

我不知怎样回答，也顾不上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女人，盯着她那笑意飘忽的脸和喃喃低语的嘴唇。

她说什么？她在说什么？是在讲述那次带学生下乡劳动的事？

妈妈是中学教师，1965年夏她带学生下乡劳动，我送妈妈去学校，下了公交车刚走几步就碰见了一群学生，马上有人走上来接过我提的小箱子和妈妈手上的网兜，热情地说：“老师，我先帮您把东西送去。”

劳动回来，她拿回来几张学校里的油印小报，有一张上面表扬她在带学生下乡劳动中连夜给学生补划破的衣服，标题是：“热爱学生的好老师”，旁边还配了一幅老师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插图。

妈妈把报放在桌上，没说什么。我看见了这条消息，拿着报去问她。她笑着讲，一个学生的衣服在劳动时挂破了，都是男生，谁也不会补（妈妈任教的学校是男生校），又只带了一件，所以她就赶着给补上了，还说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学生就记住了。但能看出，她说的时候很欣慰，并且因为受到表扬还有些不好意思。

也许，她是在说着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许诺？

我上高中那年，妈妈送我一个红色硬纸壳的日记本，她题词勉励我努力学习，不断争取进步。日记本的插页是当时刚刚上演不久的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剧照。妈妈一页页地翻着，指着告诉我，这些服装多么好看，这位演员的歌唱得多么好听……，最后满怀向往地说：

“听说这个舞剧特别好看，以后我一定带你们去看！”

妈妈永远也没能带我们去看，她的这句话永远带着喜悦与向往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就在9月8号，“文革”开始不久，妈妈就被她的学生打死了。（但愿不是她给补衣服的学生吧！）这一年她42岁，通知我们说她是“畏罪自杀”。父亲已经被关在“牛棚”不能回家，家里大人只有祖母，我们姐妹兄弟四人，谁都没有哭。没有人命令不许哭，但那个时候，家里亲人被打死是不许哭的，这连刚上小学的妹妹都懂得。

妈妈离去已经快一个月了。她的话语、声音，她的动作、笑容，忽然间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今天，这个头发有些凌乱的、高高个子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蓝裤褂，和妈妈差不多年纪。她一直把她的目光，笑容，还有她喃喃的低语全都投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她是谁？她到底是谁？是妈妈，她就是妈妈！

游行终于开始，我走在队伍中，只觉得木然昏沉。我知道，为了显示盛大的场面，今年的游行要求全体师生都参加，否则，会有一多半同学因为“出身不好”被排除在外，我当然也在被排除之列。

那天夜晚照常放礼花，我带着弟弟妹妹到胡同口去看。那年的礼花红色的特别多，在远远的天空热闹地绽放。每次礼花升起，周围的人群就腾起一片欢呼，往年我和姐妹们也是这样，可今年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他们小小的身影靠着我，我们静静地看着，一声不响，礼花无比凄凉。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死去十二年的妈妈终于得到平反。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今年是妈妈的八十岁冥寿。我无论如何想不出八十岁的妈妈是什么样的。这么多年来，只要想起妈妈，我就会想起1966年游行队伍中那个女人，凌乱的头发，一身蓝裤褂。——哦，还有那件小外套。那是妈妈死后一年多，学校发回她的遗物，少得可怜的一堆东西里，有一张取衣单，按地址找去，是个裁缝铺，也兼改旧翻新。父亲的一件细毛料西服小了，妈妈将它拿去翻改成一件女式小外套，正是在那场可怕的风暴来临前夕。我去取衣服，衣服还在，铺子里的人什么都没问，什么都没说，把衣服拿来包好递给了我。小外套改得很好，像新的一样，样式是妈妈自己选定的，尺寸大小都是按照妈妈的身材仔细量的。妈妈穿上这件衣服，一定得体而漂亮。她总是那么盯着我，她的微笑，她的眼神，还有那喃喃的低语，她在说什么？她到底是在说着什么？

也许，这三十八年来，她一直在询问：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做为母亲，爱自己的

孩子；做为老师，爱自己的学生。我只是想努力地工作，好好地生活。是什么东西剥夺了我这种最起码的权利？在和平年代，是什么东西，需要这些平凡人的生命当做它的祭品？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要夺走我的生命？

妈妈的女儿，我，如今已过知命之年，仍然觉得自己很年轻，觉得前面还有一段长长的多彩的生命。妈妈的生命却终止在四十二岁，当时在妈妈心里，与她的生命一起被扼杀的，又还有着多少五彩的追求与渴望啊。

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给出回答。

~~~~~

## 【史海钩沉】

### 批判相对论轶事

• 杜钧福 •

1967年底，到湖南串联的北航《红旗》红卫兵在当地发现了一位相对论批判者周友华，把他当作宝贝带到北京。周是湘潭的一位中学教师，当时致力于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周到北京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物理所的革命委员会派一位青年科技人员帮助他弄请自己的思路，但二人合作得并不很愉快。原因是周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小人物”是受到毛泽东赞赏的，那时是个像“革命小将”一样很光荣的名称），有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视合作者为“反动学术权威”。

1968年初，在中科院物理所的四楼礼堂召开辩论会。到会的除周友华以外，还有物理所及中国科学院其他所及科学技术大学（当时还在北京）的一些人。先由周阐述他的论点，然后大家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批评意见多于支持意见。物理所的人几乎全都反对他。科技大学有一些老师支持他。院革命委员会成员陈小虹也表示支持他。

过了一段时间，在原来地点又召开会议。原来以为还是辩论会，到那里一看才知道周友华没来，不知何故。但与会者仍继续表达对这一问题的意见。这次几乎是一边倒，全都批评周友华。陈小虹也撤回了自己的支持意见，说上次表态不很合适。

两次会议上的反对意见都是先表扬后批评。他们这样说：周友华将毛泽东思想用在相对论研究上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观点在科学上是有错误的。针对这种说法，笔者也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我说，周友华宣称他将毛泽东思想用在批判相对论上，并不能表明他真想这样做，即使他真想这样做，也不能表明他真这样做了。按照毛泽东思想，事物的运动是其内因推动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现在周友华说，热的物体重量较轻，就是将两种物质运动形态混淆了。热运动对于重力来说是外在的因素，不会直接发生影响。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知道对于周友华这样的人，必须打破他的政治优越感，才能批倒他的错误，光讲科学批不到位，只能以“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

但是可惜周友华未能听到我的意见。后来就没听说他的消息了，也许回湖南了。

这次会议后，批判相对论的群众运动阶段结束。等到大家快忘记此事的时候，却听说科学院成立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小组。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大家不很清楚，虽然觉得有些好笑，但也感觉没什么。小组成员大家都认识，知道他们对物理还是明白的，不至于犯周友华那种低级错误。再说科学无禁区，相对论又不是不可批判的。当时科研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呆着也是呆着，让他们批判去吧。

另一好笑之处是，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理论室都解散了。科学院的四大任务都是黄淮海治理一类非常实际的课题。而在这个时刻，一项离实际最远的研究项目却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

大概在1969年底，他们弄出一个本子。不很看得懂，但确实有荒谬之处。后来就听说几位老科学家委婉地表示不同意，事情就过去了。这说明当时领导确实还算明智。但是后来上海有一帮人接着批，这批判战场就转移到上海去了。

批判相对论与造反派保守派无关。不管什么派，只要有一点科学知识，都觉得是笑话。至于上海那些人，很难说是造反派。但科学院那个批判小组里的人如何想，我不很清楚。改革开放后，有该小组中人郭汉英先生应邀对台湾《物理》杂志发表谈话，说他们其实是很反对批判相对论的，只不过是钻进去当内应。

近年来才听说批判相对论有陈伯达的因素，当时我们不知道。只是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人给总理联络员刘西尧贴大字报，说：听说毛主席对批判相对论有批示，如果有，你刘西尧为什么不传达？

所以此事毛泽东是否表过态，还是个悬案。

批判相对论的笑话，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在不断上演，只是不再贴“毛泽东思想”的标签了。但当事人仍经常以掌握了真理但被控制着科学界大权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压制的身份出现。这一点和文革时代相同。

□ 原载网刊《记忆》2009年月第16期

~~~~~

## 【往事追忆】

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 ◇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1981年的春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南京出差，厂里急电要我回厂。在党委周书记办公室里，周书记亲自问我北航批斗彭德怀的事，我如实地向周书记做了交待，内容与本书里写的一样，全是实话。

很奇怪，这些事抓“5·16”时早讲清楚了，当时党委也作了结论，认为我文革中没有



什么大问题，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是好同志。前不久中央某大部还要调我去当“第三梯队”并对我进行了兴师动众地审查和考核，最后同意调动，科里还开了欢送会。因当时国务院各部委暂时人事冻结，办不了手续让我等着（谢天谢地 我最后没有混入国家机关）。今天周书记又提出批斗彭德怀的事，又不是外调，看来事出有因。我问周书记怎么回事，周书记让我冷静，并把一份上级文件交给了我。

“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咱们再好好谈一谈，事关重大，你要冷静。”周书记对我说。

我拿着文件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份通天文件，内容如下。（注：事过多年，因没法查对原件，记忆有限，语言可能有误，但主要内容如此。我绝不敢伪造中央文件。）

####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北京航空学院、国营第738厂党委：

经查实，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戴维堤在文革中多次指使人殴打彭德怀同志。在1967年7月19日，伙同韩爱晶等人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残酷地斗争和迫害，打破了彭德怀同志的头，打断了肋骨，把彭德怀同志打成重伤。在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上，戴维堤任总指挥，指使刘向东等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继续迫害。殴打，导致彭德怀同志7年后得了癌症，含冤去世（最后这句话有没有，记不清了）。以上事实皆已查清，证据确凿。望有关单位党委严肃处理，并把处理意见上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乖乖！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红头文件，我绝对认为是天方夜谭。

我气得手直发抖，周书记怕我把文件撕了，赶紧夺了过去。

“你别急，有话慢慢说。事关重大，我们党委研究后决定让你看一下文件。希望你能尽快写出检查。根据你的态度，党委再决定处理意见。”周书记也是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但比当年军管会的人态度好，说话很客气。

“你们真要处理我？我告诉你周书记，这份文件是假的，是伪造的，上面全是胡说八道。”我没好气地说。

周书记生气了，拍了一下桌子说：“大胆！你敢说中央文件是胡说八道！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个态度，我们要保你也没法保了。”

“我不要你们保我，没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关。67年7月19日批斗会我站在后面听了几句就走了人，抓‘5·16’时我早交待清楚了，当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有什么错？‘7·二六’批斗大会我不在北京，怎么成了总指挥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什么？7月26日你不在北京？”周书记一惊。

“我祖母病了，我7月25日下午回的山东，坐的十一路电车去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开大会，车到东单时走不动了，我记的清清楚楚，26日上午到潍坊下了火车就回老家了。我又没有专机，怎么返回北京主持大会？肯定是北航某些王八蛋栽赃陷害我，欺骗了上级。你们党委要处理就处理吧……”我越说越气，下面的话没说出来：“我操他们八辈子祖宗！我要到中纪委大门口去喊冤、绝食、自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周书记忙说：“别急别急，你说的可是实话？”

“好汉作事好汉当，杀人不过头落地。我决不说假话。”

周书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还能不能找出当时的火车票来？”

“这就难说了，十年了，我早丢了。”

周书记点上了一支烟，坐在那里拼命抽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事关重大，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上级的文件说“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让党委直接处理我，他很难办。

“周书记，你们不要为难，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会骂你们的。我自认倒霉。”我诚恳地说。

“你给我住嘴！”周书记突然站了起来，用拳头用力砸了一下桌子，“你把共产党看成什么人了？共产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周书记这个人，我很尊重他。他也是行伍出身，原来在部队支过左，转业到厂里任书记刚两年。

我向周书记再次保证，我决没有参与批斗彭德怀，希望党组织相信我。

周书记让我回去好好工作，相信党委和上级会正确处理的。他反复叮嘱我，此事保密，回去不要乱说，更不要胡来。

我不想也不敢胡来，但中纪委（当时的）这样干，不是胡来是什么？这件事太令人可气，放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出格的事我不干，但向中纪委和中央写信申诉一下总可以吧！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用毛笔书写多份，寄给了中纪委和当时的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此信我留了底稿，内容如下：

紧急申诉

中共中央、中纪委各位首长：

所谓我是1967年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现场总指挥一事，纯系诬陷。中纪委有关文件就此事对我的点名指控是无中生有，因而是错误的。对此，我万分痛心并深表遗憾。事实是，1967年7月25日下午，我因急事从北京火车站离京了。次日，我在山东半岛。我既无分身之术，也无专机，我不可能赶回北航指挥批彭大会。另外，即使我在北航，这个大会我也没有资格主持。

北航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同志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天发誓对得起彭老总。之所以发生如此谬误，完全是北京市某些不称职的办案人员粗心大意造成的，我暂无理由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执法犯法。而中纪委的有关办案人员偏听偏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我党最高权利机构的崇高信誉和法律之神圣尊严，请中纪委首长百忙中过问此事。如最后事实证明本人是强词夺理，顽固不化，愿受法律之严惩；如系中纪委方面的责任，请求在《人民日报》为我平反。

此致崇高的敬意

北京738厂 戴维堤 1981年12月24日

结果，我发出的所有申诉信皆石沉大海，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分配到东北某单位的一个北航学生刘向东（原名刘汉儒）欺骗了组织。他原是北航红旗造反大队的成员，曾打过彭德怀。我接管保卫部时，把他开除了。组织审查他时，他一口咬定所有坏事都是我让他干的，并说我是批彭大会的总指挥。他的口供差点把我致于死地，可气的是，直至今日，他也没有向我赔礼道歉。文革中一句时髦的话是“触及灵魂”。文革的确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许多人在文革舞台上尽情地表演，打人，整人，干坏事，一旦挨整和面对审查，其丑恶的灵魂更加暴露无疑。

过了几天，我在厂里碰到了工人张某。老张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一直被厂里抽调去搞专案，但此人很讲政策和原则。我俩是朋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厂里搞我的专案。他爱人在农村，生活较困难，我曾接济过他。他爱喝酒，我常请他到家里喝酒。今天我又请他下班后回家喝酒。

老张很高兴，他说：“今天你请我喝酒就对了，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事？”我问。

老张见周围没人，悄悄地跟我说：“我刚从东北回来，你的事否了。”

我一听，又惊又喜，老张说下班回家再说。我立即骑车去商场买酒菜去了。

酒桌上，老张告诉我，为中纪委文件的事，周书记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我的问题。有人主张严肃处理，定为“三种人”，开除厂籍，上报就行了，是否刑事处理由上面定。有人主张再调查核实一下，这自然要担风险，因中纪委文件明明说“证据确凿，严肃处理”，没有让再调查。基层党委对上级定案的事再调查，这绝对是“犯上”，但周书记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再调查一下。

“我们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戴维堤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很复杂，事情又过去多年了，难免出错，再调查一下，我们心里也踏实。上面追究下来，我负责任，这件事我建议几个常委支持我。”周书记征得几位主要党委成员的同意后，立即派专案组赴东北长春调查，并向专案组人员交待了有关问题。老张是专案组成员。

738厂党委派的专案外调人员到达东北长春刘向东的单位时，该单位领导十分不友好，他们拒绝配合，并对738厂的反调查表示吃惊。材料是他们整出来的，他们立了大功，好不容易抓出了“大坏蛋”，你们738厂党委想干什么？

738厂当时是地师级单位。738厂的干部见过世面，专案组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据理力争，一定要见到当事人刘向东，并核实材料。对方没有办法，只好把刘向东从“牛棚”里押了出来。

当着刘向东单位领导的面，738厂调查人员对刘进行了询问。刘把自己的交待重述了一遍，与原来的交待一致。

“刘向东，那天大会总指挥究竟是谁？”老张问。

“就是戴维堤，我亲眼看见的。他是保卫部长，我们都听他的。”

“你说的是实话吗？”

“绝对是实话。”

“你知道批斗彭德怀大会总指挥，在会上把彭德怀打成重伤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知道，是反革命罪行，要坐牢的。”

“你同戴维堤有什么矛盾和仇恨吗？”

“没有，我们很熟，关系很好。”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时间这么久了，难免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你再好好想想。”

这时，刘向东单位的领导突然站了起来，指责738厂专案人员在搞诱供，双方争吵了起来。

老张当过兵，多年搞专案，见过世面。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怕什么？刘记错了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戴维堤不在现场，戴26日在山东。你们懂不懂不在现场是什么意思？”

这时，刘向东的头上开始冒出汗珠。

“刘向东，你老实交待，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你若欺骗组织，诬陷他人，是要从严处理的！”老张严厉地说。

刘向东的汗都流下来了。他两手捂着头，痛苦地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可能我记错了。”

刘向东单位的领导说：“刘向东，你想翻案，罪加一等，你欺骗组织可是罪上加罪！”

“我不是欺骗组织，我确实是记错了。我想起来了，那天不是戴维堤主持的大会，我没看见戴维堤，因为跟他熟，我就记成他了。对，我想起来了，是张某某主持的。”

事已至此，只好重写材料。对方极不情愿地在材料上加盖了公章。

老张说到这里，我立即站了起来，端起一茶怀二锅头，与老张碰了一下杯，一口喝了下去。

老张又说：“外调材料已交给了党委。周书记看了后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这家伙不错，是条汉子。”

第二天，周书记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说我的事查清了，让我不要背包袱。我对党委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要为厂里好好工作，但我要求上级向我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不在《人民日报》平反，也应下文否定原来的文件。周书记让我不要胡闹，说：“母亲打几下儿子，那里有赔礼道歉的？你给我好好干活去吧！”

后来，738厂党委写了报告，附上了外调材料和我本人的申诉材料，上报了上级有关单位。据说当时党委主要领导都在报告上签了字。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母亲”果然没有必要向“儿子”赔礼道歉，我早知道结果会如此。

令人可气的是，几年之后，周书记调走了，换了新党委书记姓王。在给我做“文革结论”时，按照上面的“旨意”，仍说我参加了批斗彭德怀会议（指7月19日小型预审会）并作为我的主要罪状之一。尽管我提出抗议，但仍以此强行定案。

事实证明，所谓“母亲打儿子”这个比喻文不对题，很不确切，因为母亲不认为打的是儿子，母亲根本不认这个儿子。这个狠心的母亲把作错了事的儿子扔进井里，还不停地破口大骂。作为儿子，既然苦苦哀求没有用，也只好宣布这个母亲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自己的真正母亲是真正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写下这些文字，笔者心如刀搅。

#### ◇ 关于“三种人”问题

打倒“四人帮”之前，全国轰轰烈烈抓了几年“5·16”分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又大张旗鼓地抓起了“三种人”。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把‘三种人’清理出去。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一反温文尔雅风度，快人快语又刺刀见红：“如果对三种人心慈手软，就给党留下了隐患，一旦让他们东山再起，我们果真要人头落地。三种人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包括你们在座的，都有刻骨的深仇大恨。对他们要统统开除出党。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留在班子里。不这样，将来总有一天他们要挖我们的祖坟！”

邓小平还说：“这里我们还应该强调，要着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较年轻，潜伏下来的，对党危害大的人。当初王洪文跟我斗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20年后再看是谁的天下。这话对我影响很深。的确，我们老了，他们还年轻。如果我们不谨慎，让他们钻了空子，一旦他们爬上来，那我们的江山还会被他们篡夺去。对那些年轻的三种人，一定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

薄一波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局级、处级及基层单位和企业里的三种人，他们有些人还不死心，千方百计的留在党内，等待时机，说十年再见，20年再见。如果不搞出来，就会埋下定时炸弹，这就是隐患，要十分警惕。”

杨尚昆笑着说：“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把一波同志整死，一波同志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薄一波说：“不光是我恨，我看全党全国的正直之士都恨他们。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他们戴着红帽子，整起人来最狠。”

胡耀邦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这样规定，有助于我们划清界限，掌握政策。至于那些年岁大了，已经查清和处理过了而又没有发现新的或较大的问题的干部，我的意见一般的就不要再翻老帐了。我建议今后取消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提法和做法。”胡耀邦的话总是同老人们有点差距。

根据以上老人们的指示，全国大张旗鼓地抓开了“三种人”。正象毛泽东号召整走资派时把所有的老干部几乎都打成走资派一样，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和参与过一些造反活动的群众又被整了一遍。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不反对——也不敢反对整“三种人”。对文革中那些紧跟“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打死打伤人命者，指挥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造成严重后果者，应当整，判刑、杀头都可以。但是，不能搞扩大化。对于犯了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历史地分析，大人不计小人过，手下留情，批评教育，吸取教训，既往不咎，更不能让人家一辈子不得翻身。

据我所知，我一个分配到江苏的老同学由于在外地串联时与造反派们一起冲过军区大院，被定为“三种人”，整出一身病，不久便死去了。分到西安的一个老同学在别人打人时仅说了一句：“反革命该打”，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年多，定为“三种人”，放出来时当了个体户。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学生因文革初打过人，对文革中经手的一支破左轮手枪记忆不清，没说清楚，（注：这支破枪早已经我手上缴了北京卫戍区，最后卫戍区证明有帐可查。）结果也被定为“三种人”，并被开除了厂籍，老婆也离了婚，如今仍孤身一人，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连劳保都没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包括笔者）一不认识“四人帮”，反是造过，但没有“起家”，也没有参加武斗打死打伤人，也没有抢过谁砸过谁，只因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参与造反而获罪。至于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帮派思想严重？文革中谁没有派性和“帮派”思想？说不清。宣判犯人时，在法庭上还允许申诉和请律师辩护一下，而定“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时却不允许人家申诉，更不准请律师辩护，全在当权的共产党基层党委某些人一张嘴。正像当时抓“5·16分子”一样，真正是说你是不是也是。

事过多少年之后，笔者始终认为，“三种人”的提法十分不科学，因为它是个模糊数。从老人家们当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看，“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谁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渣滓洞”，这样给“三种人”定义按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可是，却整了成千上万。如果说毛泽东文革初期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混淆了敌我，革命“革”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应当全盘否定。那么后来的抓“5·16”和整“三种人”就无懈可击、完全正确吗？没有冤假错案吗？几十年来，这些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绝大部分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一般干部，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所谓“根正苗红”的青年学生）始终不得翻身，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成了新时期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的出气筒和发泄仇恨的活靶子，这时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中国啊，我们可爱的母亲！共产党啊，我们救命的恩人！您干瘪的胸膛和贫穷的脊梁为什么总适宜生长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造反派”、“5·16分子”、“三种人”，再加上如今的贪官污吏抢劫犯，发廊赌场加妓院之类。这些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时候才能绝迹呢？

我不是“三种人”，可我比“三种人”还“坏”。738厂后来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1986年才给我定案，说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一）在北航参加过批斗彭德怀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同志被打成重伤，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的全过程，本书已交待得令历史老人汗颜，不再赘述。时至今日，我借次书向国人和全世界申告，文革中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彭老总问心无愧。某些人后来虽然不得不否定了我是“726批彭大会总指挥”这一重大罪状，但仍很不甘心。要是全否定了我的“批彭”问题，就不好把我定为“三种人”，他们多年来整人的功劳也没有了，没法向主子们交代。于是，他们丧尽天良地继续对我下毒手。当时，专案组的同志把结论初稿交我看时是这样写的：到过批斗彭德怀会议现场（指“7·19”预审会），经查未发现有任何言行。（注：到过现场又怎么啦！文革中连周总理还参加过批斗陈毅的大会呢！关键是在会上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按说未发现任何言行的话，写入结论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不，可以改一下。于是，某些人大笔一挥，轻轻地改了一下，就强行塞进了本人的档案。这一改，本人便成了迫害彭德怀的坏人；这一改，令文痞姚文元先生汗颜，自叹弗如。我在“7·19”会议室门口站着看了两分钟就走了人，什么屁也没放，也算罪状？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二）向江青写信寻求支持。

抓“5·16”之后，我对738厂的做法有意见。738厂某些人告诉我，你的问题全是北航捅的材料，你不要埋怨我们。我一打听，北航抓“5·16”也毫不逊色，连反对北航红旗的许多干部、教工也被打成了“5·16”分子。鉴于抓“5·16”运动严重失误和造成的后果，我认为应当向中央如实反映一下基层的情况，于是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告了北航的状。此信我同时正大光明地交给了北航党委和738厂党委各一份，没料到，我成了“自投罗网”。

我的上告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江青同志转伟大领袖毛主席收。

于是，我变成了向江青写信请求支持。

由于时间已经久远，我的上告信又没留底稿，详细内容记不准了，里面可能有向“江青同

志问好”并请求中央过问、调查基层抓“5·16”扩大化的内容。我至今认为，就算当时向江青本人写信反映抓“5·16”运动中的问题，也没有罪。江青当时（1972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不是国民党中央文革负责人，更不是法西斯文革负责人。当时连整我的人们也正大喊“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有何罪？

（三）北航红旗干的许多坏事，戴维堤负有领导责任。

恕我直言，若每个单位的头头对下属人员干的坏事都要负领导责任并定罪的话，全中国将没有一个人好人。

于是，考虑到戴本人出身好，表现也可以，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即“三种人，事实上是“敌我矛盾”。），上报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纪委。

当时对这个结论本人嗤之以鼻，拒绝签字，但不签字无所谓，照样定案，并装入档案。从此，我成了一辈子不准出国、不准入党、不准当官的“三种人”。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尹聚平最后也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是“在王力的黑手指挥下反军乱军”之类。

开始，对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结论似乎没太在乎，犯了“轻敌”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大斗争。文革中犯错误全是政治性的错误，中国连三岁小孩也犯有政治错误，因为三岁小儿也喊过“打倒刘少奇”，这不可能是生活错误和经济犯罪。

我个人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干过错事，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文革中我认为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奉常委之命去大连搞了一些子弹（没有枪支，因为中央已经给北航发了数千支枪）运回北航，详情本书已经说明。我认为这是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缺点错误，我写个检查也就完了，我不想无限上纲。至于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错误，某些人干的坏事，如“批斗彭德怀”、“打死学生”、“反军乱军”等等，与我毫不沾边，谁干的谁负责，谁指使的谁负责！我一个革委会委员，凭什么负领导责任？文革中，在北航我没参与迫害和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没干过任何打、砸、枪的事，甚至连小偷、流氓也没打过；除文革初见过一次江青外，同“四人帮”没有任何连系。文革中，作为“北航红旗”的原一把手和组织保卫部长，没干过任何坏事，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好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打破一块玻璃，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损坏一件教学设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文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保管着卫戍区发的数千支各式枪支和弹药，没出任何问题，这件事至今许多人不相信。当时连卫戍区的同志都说不简单，可惜没给我记功，使我至今耿耿于怀。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成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王力和许多林彪事件的重要成员才定的“严重政治错误”，我们算老几？

很快，我就尝到了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厉害。

我被分到科室工作后，厂里、科里出国培训、参展的名额很多，我所在的科室成员全部出过国。有的人轮了二次、三次。每次论资排辈该轮到我了，就一下子跳了过去。大学毕业生轮完了，中专生；中专生轮完了，初中生、一般工人去，始终没有我的份。开始，还挺恼火，后来就习惯了。出国算什么，不就是背个彩电回来吗？千万别象吃不到葡萄的狐狸那样下三烂。

这些年来，在共产党牢固的基层政权国营北京738厂里，我只有老老实实干活、夹起尾

巴做人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管着我，哪怕同一位小徒工组成一个小组，我也只有当组员的份儿。任何好事都与我无缘，任何坏事都与我沾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那场“大戏”，我正在汕头，（注：为临时打工的公司办事，决不是想跑往台湾。）北京有关方面也没有忘记查我去过天安门广场没有。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